

# 士绅化是给城市拓荒吗？

文/尼尔·史密斯 译/李晔国

士绅化的推进,与其说是通过勇敢的拓荒者的行动,不如说是通过资本的集体所有者的行动。士绅化完全是一个国际现象。在它的语言中,对前沿意象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农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间英雄。

## 1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1893 年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958 年版)这篇具有典范意义的论文,他提出:

美国的发展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线条的前进,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向原始状况的回归,并在那个区域有新的发展。美国社会的发展就这样在边疆持续不断地开始着……在这一进程中,边疆是移民浪潮的前沿,是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荒野被越来越多持续增长文明线条所渗入。

在特纳看来,开拓边疆,压制荒野与野蛮,其目的是在桀骜的、不合作的自然界中开辟出可居住的空间。这不仅是单纯的空间扩张和物理世界的逐步驯化。开发边疆当然能够达成这些目的,但对特纳来说,它也是定义美国民族性格独特性的核心体验。随着身强



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 1954—2012), 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与地理学教授

力壮的拓荒者每次将边疆向外推进,不仅新的土地被纳入美国版图,而且新的血液也被注入美国理想的血脉中。每一波西进的浪潮,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将人性的冲击波传回到东部。

到了 20 世纪后期,有关荒野和边疆的意象已经不大适用于西部的平原、山脉和森林(西部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可观),反而更适用于美国东部的城

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郊区化的兴起,美国城市开始被视为“城市荒野”;城市过去是——如今大多数也仍然是——滋生疾病和混乱、犯罪和腐败、毒品和危险的温床。事实上,这些担忧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就由关注城市的“凋敝”和“没落”、内城的“社会弊病”、城市社会的“病理现象”的城市理论家们表达过,简言之,“城市不再是天堂”。城

市被描绘为荒野,或者是更糟糕的描述——“丛林”。比起新闻媒体或社科著述的描绘,这一点在好莱坞的“城市丛林”类型电影中表现得更加形象,比如《金刚》《西区故事》《梦断勇士》和《布朗克斯的阿帕奇要塞》这些电影的主题。正如罗伯特·博勒加德(1993)所说,这种“有关没落的话语”主宰了有关城市的讨论。

反城市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主题。与当初的荒野经验类似,过去的 30 年间,人们对城市的印象也经历了从恐惧到浪漫主义的转向,以及从荒野到前沿的城市意象的发展。17 世纪的科顿·马瑟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对森林充满恐惧,将其视为难以穿越的邪恶、危险的荒野、原始之地。但随着森林不断被驯化,及其在日益资本化的人类劳动者手中不断发生变化,特纳较为温和的边疆意象逐渐取代了马瑟的邪恶森林论调。这种乐观主义和扩张的期待与折射出自信与征服感的“前

沿”相关联。因此,在 20 世纪的美城市,城市荒野的意象——意味着绝望地放弃——到 20 世纪 60 年代(尽管到处都是暴动)已经开始被城市前沿的意象取代。这种转变可以部分追溯到“城市更新”的讨论,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随着独户式住宅和公寓街区的改造逐渐形成,“城市更新”继承者的象征意味而得到强化。在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语言中,对前沿意象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农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间英雄。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房地产杂志甚至谈到了“城市侦察员”,他们的工作是去考察高档街区的周边,探察地块是否适合投资,同时还要报告当地居民的友好程度。不那么乐观的评论员则控诉新出现的“城市好汉”与内城的毒品文化有关联。

正如特纳虽然认识到美洲

(下转 11 版) ➔

◀ (上接 9 版)

而紧接着,为了向时代精神靠拢,克里斯蒂娃在巴黎发布了一个仿拟的革命团结宣言:“人民的力量万岁!”(Vive le pouvoir populaire!),之后就中止了情报工作。

如果有一条可以定义克里斯蒂娃卷宗的统一线索,那应该就是弥漫在法国知识界和媒体精英界的“亲以色列”情绪。不过克里斯蒂娃显然将这种情绪视作多愁善感。1970 年,在最初提供的一份情报里,克里斯蒂娃向她的保加利亚上级报告,法国的广播和电视里充斥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声音,这些人“相当熟练地暴露他们的亲以色列主张”,“那些因采取‘激进’立场而沾沾自喜的周报和日报也是如此。”作为这种立场的代表,《新观察家》杂志遭到了克里斯蒂娃的猛批,因为他们误导性地把以色列将军摩

西·达扬(Moshe Dayan)塑造成“和平使者”。在报告的最后,她谴责了颇具影响力的法共作家、曾经的超现实主义作家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因为他拒绝支持 1968 年 8 月苏联入侵布拉格。

再怎么仔细查阅克里斯蒂娃的卷宗,都很难确定究竟是她是真心这么想,还是与此相反,她只是在告诉保加利亚间谍头子们他们认为想听到的东西。

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克里斯蒂娃以如此无力的方式否认这些卷宗,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很明显,她呈交的情报其实价值微乎其微。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情报的价值小于零。克里斯蒂娃的保加利亚上级始终认为她提供的那点信息既“微不足道”又“毫无意义”。其实,大约在 1978 年时他们决定开除克里斯蒂娃这个情报员,其中的一个原因似乎就是

一直以来她提供的情报实在太粗劣了。

最后,考虑到保加利亚国家安全机构的无孔不入,DS 试图强迫 24 岁的克里斯蒂娃配合也不足为奇。据估计,DS 现存有长达 14348 米的档案,而克里斯蒂娃在当时显然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一边是一个秘密机构,非常擅于葬送“别人的人生”,而在巴黎等待着克里斯蒂娃的是一份可观的奖学金,面对这样的形势,她又能有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

作为一个情报员,克里斯蒂娃似乎完全是失败的。但也是通过“失败”,她才成功地跟她笨拙的保加利亚上司们保持了距离。

1 972 年 9 月慕尼黑奥运会上,11 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杀害,对大多数法国左翼来说,这场惨案标志着他们永远告别了第三世界激进主义。

但《如是》同人们在通讯稿《关于 1971 年 6 月的行动的公告》中,换上了一副“巴勒斯坦革命互助团”(Le Groupe de Soutien à la Révolution Palestinienne)的新面目,他们称赞慕尼黑袭击对解救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 200 名巴勒斯坦斗士来说是“必要的”。另外,他们还声称,应该为附近的菲尔斯特菲尔德布魯克空军基地(Fürstfeldbruck Air Base)发生的血腥案件负责的是德国警察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他们认为后者“发起了这次入侵”。

法裔美国作家居伊·索尔孟(Guy Sorman)指出《如是》错就错在没能抵挡得住一种“没有边界的去道德主义”(boundless amoralism)的诱惑,这种“去道德主义”跟法国传统独有的“革命浪漫主义”息息相

关。索尔孟指出:“对自由、正义和民主的追求跟法国知识界与那些统治者的亲和并没有什么关联。我们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价值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只有笨蛋和奴隶才信奉这些……我们的知识分子崇拜革命暴力和暴力美学。难道不正是这种‘革命视角’吸引了萨特、巴特和他们的同道者吗?”

今天,克里斯蒂娃彻底抛弃了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政治实践,而是建议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应该进行精神分析——她的新研究领域。

我们不禁要好奇,当笼罩在“保加利亚卷宗”上的迷雾消散之时,克里斯蒂娃是否能够坦诚直面她的过去。

(编译自 Richard Wolin, “Was a Renowned Literary Theorist Also a Spy? The strange case of Julia Kristeva”,《高等教育纪事报》,2018 年 6 月 20 日)